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北京农业史

于德源 著

人民出版社

北 京 专 史 集 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农业史

于德源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农业史 / 于德源著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4

(北京专史集成 / 王岗主编)

ISBN 978-7-01-013886-2

I . ①北… II . ①于… III . ①农业史 — 北京市 IV . ① F3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240 号

北京农业史

BEIJING NONGYE SHI

丛书主编: 王 岗

作 者: 于德源

策划编辑: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曹 春 汪 莹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金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3886-2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 顾 问：谭维克

总 策 划：周 航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排序）：陈高华、陈祖武、林甘泉、曹子西、蔡美彪、戴 逸

名誉顾问：王祥武

执行策划：王 岗、吴文涛、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郑永华、刘仲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郑永华、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程尔奇、高福美、靳 宝

课题组特邀成员（以姓氏笔划排序）：马建农、邓瑞全、李建平、宋大川、宋卫忠、杨共乐、赵志强、郝志群、姚 安、黄兴涛、韩 朴、谭烈飞

丛书主编：王 岗

本卷作者：于德源

编写说明

2006年，历史所在北京市社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北京专史集成》作为院内重大课题立项。8年来已经出版了12部专著。这些专著是在全所同事的共同努力和所外专家的大力支持下陆续编写、出版的，并得到了从事北京史研究同行们的认可。

谭维克院长在主持社科院工作之后，对已经出版的12部专史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历史所的同事们继续坚持这一有着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们将已经出版的12部专史编为“第一辑”，又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新的12部专史书目，并得到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领导的大力支持，再次把《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同样，《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的出版也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负责编辑工作的专家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也深表感谢。

在《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之后，我们特别聘请了一批著名历史学家作为课题的学术顾问，他们为专史第一辑的撰写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在专史第一辑的撰写过程中，有些著名专家因年事已高而辞世，我们在此也深表悼念之情。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事情，这些年事已高的著名专家在学术上的无私帮助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我们做好专史第二辑的研究工作。我们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著名历史学家们的无私帮助下，在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的积极配合下，特别是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专史第二辑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一定会顺利完成。

王岗 于2014年9月

前 言

农业生产的出现，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由此产生较为发达之文明的基础。被许多人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及中国），就都是从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农业生产是以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便利条件为依据的，越是适合于农业生产的环境，人们的生产效益也就越高。因此，在人类古代社会中，自然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四大文明古国皆是发源于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中。

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带来了发展繁荣的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区。而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如北方的草原及森林茂密的地区，则会出现游牧生产和渔猎生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等。不同的生产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明模式，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影响到各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则会产生冲突与融合，共同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综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而这三种文明在古代的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其中，以农耕文明的发展最为繁盛，而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次之。这种生产发展状态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则是农耕文明居于主导地位，而游牧文明与渔猎文明居于从属地位。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皆处于不断向农耕文明学习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人文方面的结晶是儒家学说的产生及发展。先秦时期的农业迅速发展最终归结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在众多的学术思想派别中，只有儒家学说最能够代表农业生产的社会结构特征和伦理道德体系，故而最终取代百家（或者说汇总百家）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中的许多典型论断，如国家要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统治者要以德治国、以仁为本，百姓则要以忠孝立身，以勤俭持家，等等。这些文化理念的传承，延续了几千年，也就是涵盖了整个农业生产为主体的时代。

而农业生产在科技方面的结晶则是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的运用。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艰辛的农业生产中，认识到大自然的变化给生产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如何预先了解大自然的变化（即风、雨、霜、雪、雾、雹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一年农业耕作是丰产还是歉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了特别细致的观察，通过测算天体运行的轨迹而把握大自然的变化，并将历代积累下来的经验编成天文历法，又在总结历代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深自己的认识，修订行用的历法。封建政府把每年颁行历法的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

与农业生产关系同样密切的又有水利技术的高度发展。其一，是对农田的灌溉及排泄体系的建设。其大型代表作品有成都的都江堰、关中的郑白渠，以及北京地区的戾陵堰等。其二，是对运输体系提供的有力支持，即各地运河的开凿。其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京杭大运河的形成。水利技术的不断革新，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有些水利工程的完成（如隋唐大运河及京杭大运河等）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平原，是由永定河等五大水系冲积形成的一片平原，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是进行农业生产的较好区域，因此被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为“天府之国”。早在先秦时期，这里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宜种五谷，又有枣、栗之饶。古人称：有千株栗树之产者富比“千户侯”。北京地区又正好位于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结合部，这种自然环境也就带来了畜牧业生产的便利，从而使得这里又成为农业产品与畜牧业产品进行交换的贸易中心之一。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即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处），而这种特殊的环境又导致了这里的特殊发展历程。在几千年的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冲突与交往过程中，这个地方的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从中

中央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变为游牧政权的陪都、再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都，最后成为全国一统王朝的首都。这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对整个区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商业贸易等等，皆不例外。其中，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表现出了它的特殊性。

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农耕区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农民。而北京地区在成为都城之后，农业生产方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金朝统治者在把都城从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到这里之后，随之把大量女真族部落民众也迁移到这里安置，进行农业生产。而这些女真族部落的民众是按照猛安谋克的军事建置加以编制的，在生产上也就形成了“军屯”的规制。又如元世祖在营建大都城后，在都城周围驻扎了大量军队。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给问题，也采用了“军屯”的方式，一半军队执行军事行动，另一半军队从事农业生产。这时的“军屯”占据了大量京畿地区的农田。到了此后的清代，旗人占地在京畿地区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此外，北京特殊的政治环境还要兼及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的关系。我们仍以成为全国首都的元代为例，元朝统治者是从北方大草原上迁都到这里的，同时采用的是两都制度，即大都（今北京）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并行，每年春天，从大都前往上都度夏，到了秋天再回到大都过冬。这种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影响是，第一，每年秋天从大草原上带回到大都地区的马、驼、羊等牲畜以数十万头计，这些牲畜都要在大都地区饲养，要耗费大量粮草。第二，为了这些牲畜在秋冬有庄稼杆吃，政府禁止大都地区的农民秋后翻耕农田，使庄稼杆不能再成为土地的再生肥料。第三，农田不能秋耕会使田中的害虫安全过冬，并带来以后虫害的加剧。由此可见，农业生产不仅仅是一个耕作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于德源先生在历史所多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是历史所的资深研究员，研究范围较为广泛，科研成果十分丰富。他在退休以后，仍然坚持科研工作，笔耕不辍，这种勤勤恳恳、把科研作为一项事业、追求不倦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整体国力迅速提高，我们的科研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些社会不正之风（包括学术腐败）却也有了不停滋长的势头。于德源先生的研究工作遵循科研规律，以收集、整理史料为基础，不使用哗众取宠的新名词，论从史出，这种朴实的学风更是值得我们今

天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们学习的。最后，对于德源先生的这项科研成果问世表示诚挚的祝贺。

王岗

2014年8月

目 录

编写说明	王 岗 (1)
前 言	王 岗 (1)
概 论	(1)
第一章 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	(4)
第一节 地形、地貌和土壤	(4)
第二节 河流水系	(5)
第三节 气候	(13)
第二章 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	(22)
第一节 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	(23)
第二节 对东胡林遗址的再认识	(26)
一、关于对石制农具的认识	(27)
二、关于对晚更新世与全新世之际北京 地区古环境变化的认识	(27)
三、关于东胡林人的生活方式	(29)
四、关于东胡林原始农业问题的推测	(31)
第三节 北京地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	(33)
第三章 商、周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44)
第一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北京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44)

第二节 商、西周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47)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52)
第一节 春秋时期生产关系落后的燕国	(52)
第二节 战国时期燕国强盛及农业发展	(53)
第五章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61)
第一节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	(61)
一、秦苛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61)
二、两汉时期北京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	(62)
三、屯田	(67)
第二节 两汉时期地主的剥削	(68)
第六章 魏、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73)
第一节 人口的流动	(73)
一、西晋末年幽州人口的消长	(74)
二、十六国、北朝时期幽州流散的人口	(76)
三、魏、晋、北朝时期进入幽州的胡、汉人口	(78)
第二节 著名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	(81)
第三节 农业经济状况	(84)
一、魏、晋之世幽州的农业生产	(84)
二、十六国时期幽州的农业生产	(87)
三、北魏时期幽州的农业生产	(90)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100)
第一节 隋炀帝发动辽东之役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100)
第二节 唐代幽州地区的农业	(103)
一、唐代幽州及周边各州县的农业发展水平	(103)
二、唐代幽、檀、妫、蓟屯田	(108)
三、唐代幽州农作物种类	(110)
四、唐代幽州自然灾害	(114)
第三节 五代时期幽州农业的凋敝	(115)
第八章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	(121)
第一节 辽代燕地农业经济的恢复	(121)

一、辽代燕地农业恢复的有利因素	(121)
二、辽代燕地水稻种植业的倒退	(123)
三、辽代燕地田制	(124)
四、辽代燕地的自然灾害	(124)
五、辽南京菜园司	(126)
六、辽代燕地的赋役	(127)
七、辽南京寺院经济和二税户	(128)
第二节 金中都的农业经济	(129)
一、金朝前期大量搜括燕地民田	(129)
二、金代燕地的寺院经济和二税户	(131)
三、金代燕地的“租”和“税”	(131)
四、金中都的水利资源	(133)
五、金中都区田法	(134)
六、金中都的自然灾害	(135)
第三节 辽、金时期幽燕地区农业生产工具	(136)
第四节 隋、唐、辽、金时期北京地区 农业发展的总趋势	(138)
 第九章 元大都的农业	(144)
第一节 元大都军队屯田	(145)
第二节 元大都贵族和寺庙的田产	(148)
第三节 元大都的畜牧业	(151)
第四节 元大都的农作物种类	(152)
第五节 元大都的赋税	(153)
第六节 元代大都地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	(154)
第七节 元大都的自然灾害	(157)
 第十章 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	(164)
第一节 屯田和移民	(164)
一、洪武年间的军、民屯田	(164)
二、永乐年间的军、民屯田	(167)
三、商屯	(176)
第二节 明代北京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77)
一、明初额外垦荒永不起课	(177)
二、明万历中的京畿水利营田	(180)

第三节 明代北京农业的赋役	(181)
一、明代北京的田赋	(182)
二、明代北京的徭役	(190)
三、明代北京的马政	(194)
第三节 明代北京的庄田	(202)
一、皇庄	(202)
二、宗室、勋戚庄田	(208)
三、权势、太监庄田	(212)
四、明代北京寺庙庄田	(222)
第四节 明代北京的农产品	(225)
第五节 明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	(227)
第十一章 清代北京地区的农业	(252)
第一节 清代北京的旗地	(252)
一、圈地	(252)
二、投充户	(257)
三、圈占的结束	(260)
四、旗地制度的瓦解	(262)
五、典卖	(264)
六、旗民交产	(273)
七、八项旗租	(275)
第二节 清代北京寺庙庄田	(281)
第三节 清代北京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287)
第四节 清代北京农业的赋役	(293)
一、清代北京的田赋	(293)
二、清代北京的徭役	(300)
第五节 清代北京的农产品	(308)
第六节 清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	(316)
余 论	(333)
主要参考文献	(345)
后 记	(351)

概 论

今北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较早。根据考古学者在北京平谷县上宅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有关发现，我们推测可能早在距今 10000 年以前的新、旧石器交替之际，今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的萌芽；距今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早期今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

在距今 5000 年至 2000 年以前，今北京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源丰富，沼泽密布，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这为古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1975 年在北京通州的泥炭层中曾发现角镐，这说明当时的古人类除狩猎之外也开始从事比较简单的采掘活动¹。在文献资料方面，《禹贡》、《周礼》中都有关于今北京地区早期农业经济情况的记载。虽然关于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未有定论，但一般的看法，认为《禹贡》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周礼》大约是战国晚期的作品。《禹贡》云：“冀州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厥赋上上错。”古冀州包括今河北、山西两省。著名农史学家辛树帜先生认为，在《禹贡》的记载中，冀州土壤的肥力（中中，属第 5 等）与向周天子纳赋的等级（上上，间出上中之赋）不相符。简而言之，就是田劣而赋重。这说明冀州土地开发得早，利用率高²。辛先生的这一判断，被后来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业工具所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白壤，从来就有几种解释。笔者认为以《尚书》中（汉）孔安国的解释较为贴切。孔安国传云：“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³白壤实际就是盐碱土，这和北京远古时期“池沼广布的水泽之乡”的自然环境是相符的。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白壤宜于种植旱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云：“旱稻用下田，白土胜黑土。”旱稻

与水稻对称，又称陆稻，是一种宜于在旱地种植的稻类品种。现在北京地区虽然没有旱稻，但在推广水稻旱种方面却曾取得过可喜成绩。据198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北京、河北、河南、天津、辽宁等省、市水稻旱种面积共有10多万亩，其中仅北京地区就有8万多亩，亩产量一般在300公斤以上，最多可达450公斤以上。

关于我国水稻起源，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南方，是由野生稻驯化而来。大约在商、周时期，水稻逐渐扩展到黄河以北地区，甲骨文和《诗经》中有很多关于北方种稻的记载。《周礼》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宜于种稻的几个地区，包括今北京地区在内的幽州即为其一。《周礼·职方氏》云：“幽州……谷宜三种。”（汉）郑玄注云：“黍、稷、稻。”（唐）贾公彦疏云：“幽州西与冀州相接，冀州皆黍、稷，幽州见宜稻，故知三种，黍、稷、稻也。”“贾公彦是唐朝人，他所指的幽州即包括今北京地区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冀州则是今河北南部地区。冀州属二种之区；幽州属三种之区。幽州在冀州之北而宜种稻，这恐怕和幽州拥有较丰富的水资源不无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粟、黍、稷的区分，历来各家解说纷纭，没有一定的解释。不过，一般认为粟指的是小米，又称谷子，古称稷；黍指的是粘黄米，所以又有黍、稷就是指的谷类，质粘的是黍，质不粘的是稷的说法。同时把粟作为黍、稷之类谷物的总称。

北京地区的原始农业虽然略迟于今河北、河南同在太行山东麓的磁山、裴李岗地区——那里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拥有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但在其后的发展速度却并不慢。就本地区农业耕作技术和生产水平而论，与中原其他地区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战国时期，铁农具在今北京地区已得到广泛使用，它促使了农业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当时的燕国（都蓟，今北京）由一个积弱的小国最终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很快传播到今北京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家统一、交通方便、经济往来频繁的缘故。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曾一度造成北京地区人口的严重流失、土地荒芜，但频繁的人口流动又使劳动人民得到交流生产经验的机会。由于中原战乱而涌入相对来说属于东北边地的幽州的人口又给本地区增加了不少劳动力。东汉和西晋末年，从今北京地区流入辽西、辽东和内蒙古地区的劳动力，对于汉族和乌丸、鲜卑族的民族融合，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自秦汉至唐末的1000余年间，虽然今北京地区长期处于东北边镇地位，但由于其重要的地理